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民声

——
辛亥时论选

胡伟希 编选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鲁迅——呐喊

鲁迅——彷徨

鲁迅——热风

鲁迅——华盖集

鲁迅——华盖集续编

鲁迅——而已集

鲁迅——坟

鲁迅——热风

鲁迅——华盖集

鲁迅——华盖集续编

鲁迅——而已集

鲁迅——坟

鲁迅——热风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声：辛亥时论选/胡伟希编选.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55-8

I. 民…

II. 胡…

III. 1 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②政论-中国-近代-选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6,000 印张：9 $\frac{1}{4}$ 插页：5

印数：1—1,587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华玉洪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沈树东

定 价：9.70 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这里所谓的“辛亥革命时期”，是指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也即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这十年。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辛亥革命时期构成一个特殊重要的阶段：它既是维新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进一步展开，同时又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先河。

与维新运动时期启蒙思想还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呐喊不同，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已在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开展，并且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潮。辛亥革命时期启蒙运动之所以出现高潮同下面三个因素有关：1. 清皇朝统治力量的削弱。自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迫于内外的压力，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改革和推行“新政”。1901年，清政府设立政务处，作为策划改革的指导机构；1905年，朝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制，酝酿立宪的措施；1908年，朝廷宣布立宪的计划，同时颁布“宪法大纲”。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获得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支持，反而由于改革方案中包含的关于广开言路以及改革教育制度的措施，使社会上对朝廷各项政策，甚至政治体制的批评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从而使清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进一步松弛。2.

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二十世纪初，随着新式教育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施行，社会上出现了追求西学的热潮。当时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而是有关政治、社会思想方面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们“竟出新籍，如雨后春笋”^①，“欧西巨子之学说”“滔滔焉渡重洋，竟灌输吾国同胞之意识界。”^②这其中，既包括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也包括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斯宾塞、穆勒等人的著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也被翻译过来；此外，康德、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哲学也有人提倡和介绍。这些西方著作直接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启蒙思想的营养素和发酵剂，人们正是通过它们了解到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词汇和观念的涵义，从而增强了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以及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要求人的解放的决心。

3.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从洋务运动开始，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二十世纪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剧增，这当中，不仅包括公派出国的，还有大量自费出国留学的。由于政府的提倡和社会舆论的导向，辛亥时期出国留学的大多前往日本。据统计，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还只有一百人左右，到了1905年，留日学生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0页。

② 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89页。

已增至八千至一万人，而1906年，估计人数达两万人。这些留学生在日本组织各种学会，创办刊物，宣传和介绍各种西方思想；归国后，他们依然保持联络，互通声气，结成传播新思想的团体。此外，由于新式教育的施行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社会上已出现了热心追求和提倡西学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样，宣传西学的思想启蒙已不必如维新运动时的严复那样采用文言的形式，以政府官僚和绅士为对象，而是更多的采用白话文小册子和报刊的形式向社会上散发，并且在社会知识青年中具有广泛的市场。

辛亥革命时期启蒙思想之所以高潮迭起和显得繁纷多姿，除了由以上三种原因造成之外，还同当时社会政治的特殊情势有关。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是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皇权即将崩溃的十年。当时是，各派政治力量预见到清王朝的行将就木，都在抓紧时机，大张旗鼓地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这当中，有三种政治派别为影响较大者，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此外还有以刘师培、何震等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这三种势力在对待现行政治体制，尤其是设计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上，看法歧异，甚至形同水火。例如，立宪派主张以渐进、和平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革命派以反满排满相号召，提倡进行推翻清朝的政治革命；无政府主义派要求废除一切政府，实现无阶级、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三大政派的政治立场迥异，但认为

中国必须刷新政治，并且进行社会 and 道德、风俗方面的变革，却是它们一致共识。在政治态度上，它们无论是持激进、渐进甚或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口号，都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启蒙无疑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主旋律。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存在着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尽管这三大政派都主张思想启蒙，但它们的启蒙思想往往同它们各自的政治态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启蒙思想观念的涵义在重点上会有所区别。例如，对于立宪派来说，它着重宣传的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注重个体自由甚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对于革命派来说，主要是宣传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而无政府主义者向往的则是社会平等。但抛开这些区别点不论，在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时，我们注意的应是这一时期时代思潮的总体特点。梁启超在谈到“时代思潮”时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

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①循梁启超这一思路，我们来看看，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到底有何特点呢？

第一，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激烈批判。由于社会政治生活正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显得异常地活跃。无论是立宪派、革命派还是无政府主义派，都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封建专制政治。1906年的《复报》发表《中国尊君之谬想》一文指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手掩尽天下目，一人独压万人上”^②，其结果是“我国民有国之名，无国之实，盖已为第二印度第二波兰久矣。”^③文章还呼吁：“张良之大铁锥，荆卿之利匕首，其飞鸣出匣轰然落地，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乎，此其时矣！此其时矣！”^④这篇文章代表的是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观点。即使是政治立场并不那么激进的立宪派，对于封建专制政治也表示深恶痛绝，与之誓不两立。反映立宪派政治观点的《国风报》发表《立宪政治与舆论》一文就指出：“夫专制时代，一国之政教法令，皆秘之少数官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1—12页。

②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3页。

④ 同上书，第546页。

吏掌握之中，自非肉食，无能过问。”^①“专制政体之下，固无舆论发生之余地也。”^②“立宪时代则不然，一切庶政无不取决于舆论。”^③显然，立宪派之所以反对封建专制政治，是因为封建专制压倒舆论，这与立宪主义者所要捍卫的言论自由相悖，故立宪派是从维护个体自由的原则出发来批判封建专制政治的。至于政治态度较之共和革命派还要激烈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无政府主义者要实现的是废除一切政府，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封建专制政治则与他们的政治纲领截然地对立。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新世纪》发表文章批判“君为臣纲”的观点说：“君亦人也，何彼独享特权特利？曰因其生而为君，是天子也，此乃迷信，有背科学。若因其有势力故然，此乃强权有背真理。”^④总之，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封建专制制度之所以不合理，就在于它违背科学与真理。从以上可以看到，立宪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在批驳封建专制制度时所持的论据并不相同，但对封建专制政治采取截然否定的态度则是一致的。较之维新运动时期严复与康有为等人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辛亥革命时期批判的调子要激烈得多，它们针对旧制度要下的药方也具体得多。而且，这些批判并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文字，伴随它们的，往往还有实际的行动，如立宪派推行的立宪请愿运动，

①②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24页。

④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1016页。

以及革命派组织的反满武装活动，等等。

第二，要求人权与崇尚自由。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潮突出了人权这一概念。在它看来，封建专制制度之罪恶有千桩万种，归根到底在于它蔑视和践踏人权。什么是人权？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思想背景的人会作出不同的理解。例如，《私心说》的作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争取个人的幸福及基本人权，提出：“凡属人类，皆不免有自私之见存；诸公诸公，尽可于一己之私，善自为谋；诸公诸公，第竭其毕生之精力以求私益。”并且指出：“有利于私，必有利于公；有害于公，必有害于私。”有的人则从强调自由意志的观点出发，将“人权”解释为“贵我”。《教育泛论》一文说：“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二大主义。何谓二大主义？一曰贵我，一曰通今。”而它对于“贵我”的理解是：“一人之行为，必由一人之意志决之；一人之意志，必由一人之智识定之。自由者，道德之本也，若一人之行为，不由于一人之意志而牵率于众人，勉强附和，则失其独立之精神，丧其判断之能力，而一人之权利，遂以摧残剥落而莫能自保。”总之，它对于人权的理解就是各人有按其自由意志独立判断和行事的能力和权利。《博爱主义》一文，则认为“博爱”乃人权的同位语。因为人权就是做人的权利，承认人权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做人的权利。“爱者，自然之经；争者，不得已之权。权无害于经，争固无妨于爱”，因此，尊重人权最后必达于博爱。尽管在具体解释上有很大出入，但辛亥革命时期对人权的理解，归根到底是与自由观念联

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不同政见和思想取向的人们在看待民主和社会平等这两个问题上往往还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的话，那么，对于自由观念，他们却有共同的承诺。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种人权观念，最终可以通过对自由观念的解释得以沟通起来。可以这样理解：争取人权，也就是争取自由。人权的字眼不出现于维新运动时期而大量见诸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杂志，说明启蒙思潮发展到辛亥革命时期，对自由观念的考察更加深入和细致了。如果说在维新运动时期严复等人对“自由”的解释还只停留于“天赋人权”（“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的理解的话，那么，到了辛亥革命时期，“自由”一语由于与“人权”观念结合起来，它已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一般来说，这一时期，人们在谈论“人权”或“自由”的字眼时，大多包括如下三种涵义：1. 天赋人权（追求个人幸福与快乐的原则），2. 自主、自治，3. 自尊、自强。尤其是这其中的第3种涵义，它指的是对个人人格的尊重。故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来说，人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或社会学的概念，它同时还兼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对人权的这种看法和观点，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第三，提倡伦理、道德革命，反对封建纲常。辛亥革命时期启蒙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倡伦理、道德革命。对于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来说，政治的改革必须以伦理、道德的革命为前提，故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种报刊，无

不以介绍新的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而新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在这些启蒙思想宣传家眼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又是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相表里的，因此，无论是从提倡新道德还是从批判封建专制的要求出发，都必须批判传统道德。《论道德》一文将道德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一种是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文章指出：“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皆人为之道德，非天然之道德也；皆原于习惯、纲常名教矫揉造作之道德，非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真实无妄之道德也；皆伪道德，非真道德也。”^①如果说这篇文章主要是从中西伦理、道德观念截然对立的观点对传统道德观念加以否定的话，那么，《名说》一文则从剖析“名”之由来出发，对“名教”的产生及其危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文章指斥名教如何为封建专制政治提供理论上的根据说：“创为君臣之伦，忠义之说，定之为人纪人纲，制之为大经大法，顺之者为纯正循良，背之者为悖乱恶逆。上以此教，下以此劝，于是乎伪道德之惑乱斯民者，遂深锢于人心而牢不可破。”^②文章列数名教之罪恶说：“历观载籍，坐此执迷不悟之愚夫，盖累累焉而不可胜道，夫非名教之杀人于无形者乎！”^③不少文章还追根溯源，将名教与其始作俑者联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847页。

② 同上书，第494页。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497页。

系起来。《无圣篇》认为，名教之所以在中国有广泛的市场，是因为维护名教者利用“圣人”作招牌的结果：“秦汉以降，历世相传，有不可思议之一怪物焉，曰圣人。……君主不可得而臣，而利用之以箝制其下；尚古者不可得而友，而利用之以摄服其徒。^①也正是在这种“无圣”、非圣的气氛当中，一些启蒙思想家直接提出了反孔、非孔的命题，从而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孔家店的先声。

第四，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倡妇女解放运动。这是因为旧道德的核心思想是礼教，而受封建礼教压迫最严重的是妇女。柳亚子在《哀女界》一文中说：“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文章说中国妇女“奴隶于礼法，奴隶之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总之，中国社会之一切黑暗与罪恶，最后都无不加之于中国妇女的头上。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刊物还将女权问题同民权、人权问题联系，认为“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②《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更宣称：“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③故而，从争取民权出发，首先要争取女权。当时，创办了不少主要以妇女为对象，或专门论述妇女解放问题的刊物，如《中国女报》、

① 同上书，第261页。

② 同上书，第922页。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926页。

《中国新女界杂志》、《留日女学会杂志》等等。这些刊物分别从家庭、婚姻、教育、社会伦理等各方面就妇女问题展开了讨论，其宗旨归结为一点：要改革政治和改良社会，必须从争取女权做起。

第五，鼓吹“开民智”，重视科学教育。“开民智”原是维新运动时期启蒙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对国民教育的要求较之以前更为重视。在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宣传家看来，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政治的刷新，都与国民教育的提高成正比。故无论是从提倡伦理、道德革命还是改良政治的要求出发都必须强调教育。《江苏》杂志发表《教育通论》一文，提出了“学战”的概念，认为“地球列国，权利之得失，事势之盛衰，变幻纷纭，莫可究诘，自表面观之，鲜不谓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足以兴人国亡人国也；自内部审之，则此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所以胜所以败者，无一不以学战为总枢纽。”^①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来说，教育首先是指科学教育，这完全是针对传统教育重文史而轻科学的观点立说的。《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一文认为：今日欧洲各国，“文学盛而科学尤盛，即科学盛而文学益精，两者互相调和，互相发明。”^②文章认为，虽然文学与科学两者相互为用，互相发明，但科学其实依然是文学的基础：“试思亚历斯度德尔

① 同上书，第551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414页。

之外籀哲学，尚推理而不尚实验，然亚氏且对于科学无所不通；况自贝根、路勒斯以来，倡为内籀哲学，其学尚实验而不尚推理，苟不通科学，何以效贝根、路勒斯之实验乎？自奈端发明重学之理，其影响及于康德之哲学，苟不通物理学，何以读康德之哲学乎？自达尔文发明自然淘汰之理，斯宾率尔、赫胥黎皆取其说以言天演，苟不通生活学，何以读斯宾率尔、赫胥黎之哲学乎？……”^① 总之，西方的文学与形而上学，皆有其科学和形而下学的根据，不学习科学，就无法了解西方的文学、社会科学与哲学。可注意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对科学的崇拜与重视，还表现在提倡科学的权威，将它与封建纲常直接对立起来。《三纲革命》一文认为三纲之必须批判，就在于它是一种“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绝不相容。在《排孔征言》中，作者之所以提出“排孔”、非孔，在他看来，实因为孔子被专制统治者尊为教主，是一种宗教和迷信，因此“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②

总括以上五点，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在内容方面颇多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就不会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的高峰。辛亥革命时期的

① 同上书，第415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08页。